

◎ 陈刚 著

转型时期的

人文关怀

南京出版社

陈刚 著

转型时期的

人文关怀

zhuānxíng shíqī de rénwén guānhuái

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型时期的人文关怀/陈刚著. —南京:南京出版社,
2004

ISBN 7 - 80718 - 064 - 1

I. 转... II. 陈... III. 人文科学—研究 IV. C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43182 号

书 名:转型时期的人文关怀

作 者:陈 刚

出版发行:南京出版社

社址:南京市成贤街 43 号 3 号楼 邮编:210018

网址:<http://www.njcs.com/www.njcs.net>

联系电话:025 - 83283871(营销) 025 - 83283883(编务)

电子信箱:webmaster@njcs.com

责任编辑:余 力

装帧设计:郭春明

印 刷:南京凯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8.125

字 数:220 千字

版 次: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000 册

书 号:ISBN 7 - 80718 - 064 - 1/C · 1

定 价:22.00 元

南京版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目 录

转型时期的人文关怀(代前言)·····	(1)
一、人文精神的争论:解构还是重建? ·····	(1)
二、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争论 ·····	(4)
三、对后学的研究与批评 ·····	(7)
四、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 ·····	(11)
第一章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人·····	(16)
一、淳朴民风 ·····	(17)
二、艰辛生活 ·····	(19)
三、勤劳与节俭 ·····	(21)
四、知足常乐 ·····	(24)
五、理想主义与集体主义 ·····	(26)
第二章 思想解放的洪流·····	(30)
一、实践标准的讨论 ·····	(30)
二、改革开放的浪潮 ·····	(34)
三、观念更新与思想解放 ·····	(37)
第三章 人的觉醒·····	(42)
一、人是目的 ·····	(44)
二、人性、人情、人欲 ·····	(47)
三、人道主义 ·····	(53)
四、主体意识的崛起:异化与自由 ·····	(56)
五、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	(60)
第四章 世俗化 ·····	(64)
一、从神化与迷信中解魅 ·····	(65)

	二、破除僵化观念,推进思想解放	(67)
	三、非神褒圣、无父无君	(70)
	四、告别禁欲主义,追求现实幸福	(74)
第五章	文化热的兴起	(77)
	一、背景与原因	(77)
	二、热点与表现	(80)
	三、主题与中心	(88)
第六章	精英文化的衰落与大众文化的兴起	(94)
	一、市场大潮的兴起	(94)
	二、理想的式微	(96)
	三、精英文化的衰落	(99)
	四、大众文化的崛起	(104)
第七章	人文精神的争论:解构还是重建?	(111)
	一、庸常意识的抬头	(111)
	二、道德感的缺失:痞子与顽主	(115)
	三、文化批判:失落还是解构?	(119)
第八章	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	(135)
	一、现代性、现代精神、现代主义	(135)
	二、中国的先锋:兴起与衰微	(137)
	三、中国后现代主义的出场	(142)
	四、弱点与问题:中国离后现代有多远?	(148)
第九章	从激进主义到保守主义	(151)
	一、激进主义的兴起	(151)
	二、激进主义的衰落与保守主义的兴起	(160)
第十章	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	(170)
	一、自由主义:缘起与意蕴	(170)
	二、道路之争与经济民主	(177)
	三、自由、平等、民主,孰先孰后?	(183)

四、自由、权威与市场	(187)
当代国人的精神危机及价值重建(代结语)	(194)
一、当代国人的价值关怀	(194)
二、价值理想的失落:当代国人的精神危机	(202)
三、价值重建:我们向何处去?	(212)
附录一 转型的阵痛	
——重读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216)
一、现代化与经济发展	(216)
二、现代化与平等、正义	(219)
三、现代化与腐败	(221)
附录二 转型时期的社会公正	(225)
一、公正意蕴:理论的和历史的考察	(225)
二、我们的处境:理论与现实	(232)
三、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反差	(238)
四、分析与建议	(246)
后记	(251)



转型时期的人文关怀(代前言)

当代中国正面临着深刻的社会转型。转型带来振荡与冲突,亦带来困惑与不安。对人文知识分子说来,这方面的感受也许更深。当年陈寅恪挽王静安先生云: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其所受之苦痛亦愈深。今天的人文知识分子,其文化生命当然不是维系于旧文化,实际上他们是这场转型的热心鼓动者,因而无须为旧文化的衰落与新文化的崛起而抛洒感伤之泪,更不会像王国维那样自沉于昆明湖。但当前的转型,从逻辑上可以说是陈寅恪、王静安所面临的赤县神州数千年未有之巨变的进一步延伸和发展,因此出现可能在哲人心中掀起波澜的社会变动大背景,从抽象意义上讲并无二致。我们的问题是:在如此深刻的社会转型面前,当代人文知识分子价值关怀何在?或者说,他们如何应付这巨大的挑战而自处自立并有所关怀?这里试从20世纪90年代知识界思想重心的变化,对此问题做出梳理和回答。

一、人文精神的争论:解构还是重建?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文精神概念凸显。关于以前中国有无人文精神,以及该精神是否失落或此失落好得很还是糟得很,争论得不可开交,可以说紧扣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弦。20世纪90年代以前,没有这些问题,或者说也没有这样突出,引起社会范围的关注。因为人文精神的争论,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对不合自己理想的周遭环境之批判,当然此理想因人而异;另一方面,它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救运动,是处在新变局中的知识分子对自身生存环境及地位和作用的一种反思,或自处、自律、自为的一种努力,而此新变局20世纪90年代以来才逐渐凸显,虽然其萌芽可以追溯得更早。具体地说,人文



精神的讨论与 20 世纪 90 年代市场大潮以及精英文化衰落、大众文化兴起这个历史性变局联系在一起。许多文化人对此变化感到不安或困惑。他们不喜欢大众文化之媚俗、鄙俗和庸俗，对文坛种种衰败现象感到愤怒，于是拿起笔来口诛笔伐，抨击这个时代是“文化溃败”的时代，是“文化失望”“文化失语”“文化失败”“粗鄙化”的时代。总之，意义缺席，是一个危机的时代、失落的时代。

关于人文精神失落与否的讨论正在此背景下展开。该讨论首先由华东师大王晓明先生与其研究生的一次关于人文精神危机的对话所引发，对话内容登载在 1993 年第 6 期《上海文学》杂志上。讨论伊始，王晓明即对他的学生说，文学的危机已非常明显，它“不但标志了公众文化素养的普遍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文学的危机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危机，整个社会对文学的冷淡，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已经对发展自己的精神生活丧失了兴趣”^①。崔宜民则在发言中说^②：

我们感受到的人文精神危机有两重。首先，我们正处在一个堪与先秦时代比肩的价值观念大转换的时代。举凡五千年以来信仰、信念和信条无一不受到怀疑、嘲弄，却又缺乏真正建设性的批判……如果真的有了钱就天圆地方，自足自在，那当然可以不要精神生活，人文精神的危机不过是那批文化人的生存而已。但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民族真的可以不要诸如信念、信仰、世界意义、人生价值这些精神追求就能生存下去，乃至富强起来吗？

一石激起千层浪。人文精神的讨论很快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许多杂志开设了这方面的专题，仅《读书》杂志 1994 年 3 月～7 月就有“人文精神：是否可能与如何可能？”“人文精神寻踪”“道统、学统与正统”“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文化世界：解构还是建构？”等系列讨论相继发表。许多知识界人士加入了这场讨论，并为人文精神

① 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 页。

② 同上书，第 15～16 页。



的评价以及解构还是建构争得不可开交。起初,《读书》、《上海文学》等杂志发表的文章和讨论主要是肯定派,即对人文精神本身或当代中国十分需要人文精神持肯定态度,同时对当前文化界乃至思想界现状和人们的精神状态提出尖锐的批评。但很快出现不谐和的声音,出现批评意见甚至否定的态度。两种意见截然对立,非常鲜明地表现了当代知识界思想取向和价值关怀的差异与分歧。这些分歧原来可能潜藏在各人的思想深处,本人不一定察觉,现在被这个时代社会与文化的大转型激发出来。当然,无论是肯定意见还是否定意见,都是对人文精神这个笼统的命题表现出来的大致的思想取向,事实上,它们内部也是充满着分歧和差异的。如就肯定派而言,大致可分为道统派、学统派和信仰派或终极关怀派。道统主要重视思想、理念和道德理想、伦理价值,学统主要看重学术传统的延续和学术生命的传承,信仰则意在终极关怀。其强调重点各有不同,但重视理想与普遍价值为一。道统派不仅对现实中不合理想与价值的东西强烈不满,而且会力图改造之,即在此岸就实现自己的理想。学统派可能会对世俗的东西不屑一顾,而满足于在自己封闭的小圈子里孤芳自赏、独善其身。信仰派在弱势时也如此,但极端的宗教信仰派在得势时会强行推行自己的理想,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神圣的使命。但这在目前知识界只是一种理论可能,而非现实。

道统派是人文精神派的中坚,但亦非铁板一块,而包含了两种几乎完全不同的观点:传统派和西学派,或国学派和启蒙派。它们在历史与现实的许多重大问题上几乎是完全对立的,只是在赞成存在一种高于世俗的人文理想这个笼统的问题上结成很有限度的统一战线。因为他们发现,在市场大潮汹涌而来、大众文化声势日大和痞子文化走红的情况下得携起手来为自身生存而战,也为心中的理想而战,至于理想之差异是第二位的事。西学派的思想资源或价值理想主要是西方启蒙运动的理念,如自由、平等、博爱、理性、正义等,文艺复兴时期的个性发现和重视人的存在思想一般地说也在其中,但反对禁欲、注意追求人的世俗幸福却不在内,至少不是重点。这个差别



已为陶东风先生所察觉。其实任何学说的传入难免有所损益,强调重点也会不同,反映了人们价值取向与现实需要的差别。我国的启蒙传统,前承西方启蒙运动,中承 20 世纪初五四运动,后承 20 世纪 80 年代思想解放和文化启蒙,渊源久远,积淀深厚,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积累,无数热血青年英勇献身,80 年代末虽有挫折,但声势和影响还在,特别在许多知识分子心目中启蒙的理想之光从未熄灭,90 年代人文精神的讨论必然会在他们心中引起强烈共鸣。

总之,人文精神的讨论观点不尽一致,影响也相对有限(主要在文人圈子,而且是部分),但它的意义却不可否认。它在市场大潮兴起、社会沉迷物欲和文化激进主义遭受挫折之时重新燃起了理想主义的火焰。这理想就其自救和自保而言是低调的、低沉的,但就其文化批判的含义而言,对于那个低沉的时代无疑是高调的和激进的,表现出相当一部分人文知识分子在被认为“文化溃败”的年代其希望之光并没有完全失落,相反,人文关怀仍在,人文精神的追求不绝如缕。也许,正是这种关怀和追求使我们能在物欲横流的年代保持心灵的清明并重燃对未来的希望。

二、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争论

20 世纪 80 年代文化走势的一大特点是激进主义的崛起以及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对峙。这里所说的激进主义当然是文化激进主义而非政治激进主义,虽然它们之间有着某种关联,但落到实处价值取向相差大矣!所谓激进主义,一般指对传统、体制和权威的不妥协态度,与之激烈地对抗或坚决反对之。文化激进主义则主要指对民族传统文化持激烈反对态度,主张援引西学,或全盘西化,在此基础上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政治激进主义则主张以激烈的手段改造社会。从历史的角度看,文化激进主义主要兴起于新文化运动,后来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政治激进主义占了上风。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沉寂多年的文化激进主义才在方兴未艾的现代化热潮中找到回应。但 80 年代末,文化激进主义的路似乎已经走到尽头,文化批判、文化启



蒙、危机论、文化救国论和文化救世论,所有这些在 80 年代名噪一时的理论似乎都雄风不再。过去不受注意的一些观点却从边缘来到前台,引起人们关注,如文化弘扬、传统继承和整理国故等。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看似偶然,其实在现象深处有着更为深刻的背景和原因。

首先,文化激进主义本身包含着诸多问题,难以解决,已很难再进一步发展。例如,激进地反传统,否定传统文化,不仅招致保守主义的强烈反对,而且在高层乃至社会公众的层面引起反感甚至震怒,以至于失去了民意基础和上层支持。从实践的角度看,文化激进主义者的理论在许多方面同中国的现实脱节,即不一定合中国国情。另外,从更为深广的角度看,80 年代末文化激进主义的衰落同当时面临的社会转型不无关联。虽然这样一种转变正是 80 年代启蒙精英的文化理想,但有意思的是,它的到来却并未促成文化激进主义的兴盛而是相反。历史似乎给人开了一个大玩笑,其实自有其原因。市场经济中起驱动作用的是人之欲望、人之需要,通行的是物质利益原则和等价交换规律,所有观念的东西均退居次要地位甚至不予考虑。从此角度看,文化激进主义者的热忱理想在这个“世上熙熙,皆为利来;世上攘攘,皆为利往”的时代被冷落一边实属当然。

然而,与此同时,保守主义崛起了,人们重新开始重视传统的继承、个人的得失,激进的理想遭到唾弃。两种力量此消彼长,类似的现象让我们联想法国大革命以后的情况。当然历史不能简单类比,今天的情况与往日不可同日而语,但在某些方面似有可比之处,如理想的激情消退,个人关心自己的利益,学者的注意力也从社会转向书斋,转向纯粹的学术。具体说来,从文化的角度看,90 年代兴起的保守主义表现为:从关注社会到关注个人;从热衷启蒙到埋头学问;从理想主义到告别崇高直面世俗;从激进地反传统到重视传统文化的价值和继承;从对不合理现实的批判到全面认同、随波逐流。我们通常说 90 年代知识界“思想淡出,学问凸显”,说的也正是这种情况。许多人文知识分子从启蒙立场乃至儒家士大夫坚守了数千年的道统立场退却,而只关心学统和学问。在此方面,北大陈平原先生及其主编的《学人》、《原道》等刊物很有代表性。



90年代第一份具有民间色彩的学术刊物《学人》1991年在京创刊。陈平原主编在后记中写道：“几年来，孜孜以求，不想惊世骇俗，但愿能‘理得’而‘心安’。”在《文学》第一辑后记中再一次强调他们的追求：“追求持重厚实的学术品格。没有惊世骇俗的高论，大都是平正通达的研究，言必有据，据必可稽。强调引文注释的规范化，无非是想提倡一种老老实实读书、认认真真作文的学术风气；但愿能免‘不贤失小’之讥。”

如果说这些论述的保守主义色彩还比较隐晦，那么在其对启蒙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批评中表现得就非常明显。如陈平原在《学者的人间情怀》一文中批评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太强，自以为是社会良心和文化基本价值的维护者，动辄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而历史与现实证明这纯属自作多情。他认为知识分子应当保持人间情怀，至于政治可以关心，也可以不关心。如果关心，也出于人间情怀而不是社会责任。这样做不是过分爱惜自己的羽毛，而是承认政治运作的复杂性。说白了，不是当国师，“不出如苍生何”，只能是道德自我完善的需要。如此一来，知识分子就完成了从政治到学术、从社会到个人、从献身启蒙到人间情怀的转变。

与此同时，对文化激进主义的批判也日渐激烈。如陈来1993年在《东方》杂志创刊号上发表《20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一文，提出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运动受激进主义所主导。陈晓明《反激进与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一文，认为激进主义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是一种无所不包的神话，它制造并囊括了所有的政治灾难和文化恶果。90年代盛行保守性的价值取向，从“稳定压倒一切”这句口号即可看出其厚实的社会心理基础。他指出：“反激进主义，恪守学术化立场，推崇保守派价值，回归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反省现代性……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逻辑推论，也是合乎历史变化的实践移位。”^①王力雄著文强调他从一浪高过一浪的“革新”与“变易”中感到“保守之

^① 陈晓明：《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16页。



可贵”。类似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它们充分说明当代保守主义思潮之强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批评来自80年代的文化精英,他们曾在当时的启蒙大潮中驰骋纵横,也可以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而如今他们的态度已经发生变化。似乎时代精神正在向保守主义的方向前进。

但也必须指出,强大的保守主义思潮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批评来自于上,亦来自于下;来自于内,亦来自于外。官方或主流意识形态的批评主要对其否定革命的倾向不满。学界的批评则是在学理层面,如海外华人赵毅衡著文批评国内学界的新保守主义放弃文化批判,而对80年代的过激言论忏悔自罪:自我唾弃精英地位和责任,转向对俗文化的认同,是“集体自焚,认同市场,随波逐流,全面抹平”。甘阳认为与80年代知识界朝气蓬勃的开放心态相比,90年代更多自我封闭的故作老成。王岳川认为,坚持在中国传统文化地基上开启中国文化乃至人类文化的未来,骨子里头是一种浪漫主义。杨春时认为新儒学和国学热的新保守主义以传统对抗现代,以落后诋毁进步。而讨论人文精神失落的新理性主义缺少启蒙的精神,龟缩于个体精神的小天地,“反映了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败主义和无所作为心态,他们不敢战斗,又不甘沉沦,他们不再以启蒙战士自居,而成为文化守望者或者仅有岗位意识的消极社会角色”。

当然,也有一些不同意见,如赵敏与赵毅衡之间的批评与反批评。对此不能一一细述,但可以肯定的是,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之争论无论深度与广度的确超出了人文精神失落与否的争论,反映了当代人文知识分子在更深的层面上反省历史,也反省社会与自己。

三、对后学的研究与批评

当代中国文化的一大景观是多元共生、时空大错位,既有传统的又有现代的,既有东方的又有西方的,既有民族的又有世界的,既有精英的又有大众的,既有主流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的又有边缘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新近又有后学兴起,即所谓后现代、后殖民、后工



业社会,还有后新时期、后结构主义等等。真是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所有这些景观中,传统与现代是个贯穿的线索,当然还有后现代。事实上,80年代文化思潮的表现之一是现代主义的兴起和先锋意识的出现,90年代的走势则是从现代主义转向后现代主义。但另一方面,现代化建设仍是当代中国压倒性的中心,现代性或现代精神仍是当今社会不可替代的主题。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现象的确令人难以把握。

广义现代主义不仅是一种文艺思潮,而且也是文化思潮、社会思潮,因而折射时代精神;狭义仅指艺术界的现代派,也称先锋派。因此,现代主义在80年代中国的影响也表现在两个层面。广义的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如存在主义、尼采、叔本华的唯意志论,还有弗洛伊德的思想都有相当的影响。狭义的指文艺领域的先锋文艺,其主要特点是:(1)反对传统,追求新奇,重视实验;(2)反公众,不随波逐流;(3)追求自由、自主;(4)重视表现人的精神中负面的东西,如孤独、痛苦、焦虑、怀疑、绝望、迷惘乃至妄想、怪诞。

进入90年代以来,市场大潮盛行,大众文化崛起,精英文化衰落,不管是启蒙话语还是先锋话语,抑或国学话语都被冷落一边。即使在精英的西学领域,后现代主义也大有取而代之之势。昔日的先锋今日当然还在,特别在艺术领域,新奇的试验90年代仍然在搞,但已无往日锐气。面对市场大潮以及在此潮流中前进的现代化运动,他们感到软弱无力,甚至于对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都感到隔了一层,因而漂浮无根,没有归属感。许多人归入后现代主义的门下。后学的门庭确实人丁兴旺、香火旺盛,除后现代主义外,还衍生出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还有后工业社会理论等等,基本上都是西方的显学,而且是最新、最时髦的学说。在最新的话语理论中,新即意味着权力,因为喜新厌旧是我们人类的通病,而话语就是我们时代的文化。

后现代理论本身纯属舶来品,但该理论所描述的现象在中国却不是完全子虚乌有。概括地说来,其在当代中国出场的历史条件有:



(1) 现代化过程本身暴露出很多问题。(2) 大众文化的兴起和精英文化的衰落。(3)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哲学的影响。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指 19 世纪末以来西方所流行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如尼采的学说、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理论等。特别是尼采非神褒圣,重估一切价值,对现代派乃至后现代主义均影响巨大。这三大派的理论在 80 年代均成为显学。还有与后现代关系更为密切的结构主义理论、语言哲学等也有一定的传播,因此,90 年代人们谈起解构与重构、能指与所指、话语与权力才驾轻就熟。事实上,无论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都是对西方话语权力的认同。这一点与西方启蒙思想的传播并无区别。只不过在后学论者看来他们的话语更新,似乎更有权力,或至少他们隐隐有一种优越感,因为他们在时间上已占得先机,古典的东西似乎已经过时,退场认输实属当然。

在文学界,出现了一些有后现代风格的作品文本,如马原、格非、余华、苏童、孙甘露的实验小说,在语言叙说、叙事结构和价值取向上有后现代色彩,即叙事零散、能指滑动、零度写作。我们知道后现代主义本自现代主义而来,所以对昔日的现代派先锋说来具有后现代色彩并非难事。与后现代的价值取向暗合也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如刘震云、刘恒、池莉等人的新写实作品,用修辞大量描写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意识形态话语、崇高的价值理想和“少年壮志当凌云”的豪情抱负都消解在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之中。有许多小说和电影题目即有深度消失、零散化的后现代味道。

学术界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逐渐成了气候。一大批翻译、评述的书籍和文章问世。如佛克马《走向后现代主义》(1991 年),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1992 年),哈桑《后现代主义转折》、陈晓明《无边的挑战》、张颐武《在边缘处追索》、王宁《多元共生的时代》(1993 年),1993 年以后就更多了。具体说来,后现代研究包括这样三个群体,一是专门的研究者,即尽可能不带偏向地对后现代主义理论及其传播这个文化现象作客观地研究和分析。二是反对者,即对后现代主义取消深度奚落崇高和不要价值



理想的虚无主义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者。他们又包括主流意识形态派和人文精神派,人文精神派又包括启蒙派(西学)和传统(国学派),另外还有民族主义者。他们观点各异,有时甚至尖锐对立,但有时也互相交叉,如反对不要理想、主张人文精神为一。三是信奉者和推介者。他们完全以后现代主义者自居,并著文为其无理想、反传统颠覆一切旧有的价值喝彩。如代表人物张颐武著《大转型——后新时期的文化研究》,基本观点是:“在中国文化思潮从80年代向90年代的演变中,在世界格局由两极对立转为多元共生的喧闹中,现代性知识型在中国文化中的权威地位不可逆转地衰落了。”“现代性作为一种现实进程正趋于完结。”^①其矛头不仅仅是传统的价值理想启蒙精神,而是现代性本身。应当说,该书写得还是很精彩的,特别是在拆解80年代的文化观念、文学精神乃至人类千百年来的理想方面,确实笔锋犀利,语言尖刻,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它充其量具有破坏性,而缺少建设性。虽然他也提出“中华性”概念,但含义是什么语焉不详。其实中华性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它只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不是别的。在当今世界潮流和文化交融中我们应保持自己的特性,不失民族本色,但不能以之对抗现代化的世界潮流。

后学派理论招来很多批评,其中主要有:(1)脱离实际,食洋不化。(2)虚无主义。(3)保守主义。如前述海外学者赵毅衡先生认为中国大陆的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强大的新保守主义思潮,并历数其表现种种。他对本来在西方属激进主义的东西到了中国成为保守主义的力量感到奇怪和痛心。赵氏的论述引起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批评意见也有不少。如许纪霖先生认为该文贴错了标签,因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相当激进的思潮,它在拒斥宏大叙事的同时,将人类文化几千年来遗传下来的意义系统、价值基础一并颠覆了。还有人认为后学的流行和大众文化的兴盛构成了与官方权力话语的一种合

^① 谢冕、张颐武:《大转型——后新时期的文化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



谋,但上面对此似乎并不认同。事情就这么复杂。我以为所有这些矛盾现象与后现代主义的颠覆性本身兼有的矛盾品格有关。就其怀疑一切的虚无主义而言,它肯定是激进的;但就其把主张革新的要求也颠覆掉而言,它客观上与保守的力量遥相呼应。当然激进和保守本身不一定是负面的价值,关键看激进什么保守什么,即使在西方后学也一身二任,也有保守的一面。在现代化任务远未完成的中国建立现代普遍价值的需求显然更为迫切,从此角度看,后现代理论在当代中国负面的因素更大。因为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更要紧的是吃饭、穿衣、提高生活质量以及建立那些普遍价值,而不是理性与自由等普遍价值已发展过盛、应该连同禁锢人的极左思想一块颠覆的问题。无论如何,学界关于后学和后现代理论的讨论很有意义,因为我们诚然不能忘记现代性的意义,并且什么时候都不应把之绝对化。如王岳川先生所言,后学理论的传播促进了国家话语向个人话语的转变。个人话语本质上属于现代而非传统。

四、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

自由主义在不久前似乎还是一个不祥的字眼,至少也是敏感的问题,令许多人望而生畏。但所有这些都 90 年代铺天盖地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冲淡了,加上大众文化的冲击和所谓解构。精英知识分子从中心退居边缘,许多人对自己重新定位,不再轻率地自命以天下之重,但仍有学者在悄悄地关心社会,关心精神方面的价值,其中,自由、平等、民主等问题仍是许多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心头情结。90 年代中后期,自由主义一词在报刊中多次出现,而且不带贬义,只是介绍一种学理,甚至还有赞同的文章。朱学勤先生在《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一文中认为 1998 年的中国学术思想界,最值得注意的景观之一,是自由主义学理立场的公开言说。尽管它还很弱小,时常处于各种误解、歪曲与压制之中。他说得情况大致不差。1998 年中国知识界的自由主义思想确实有较大的发展。他认为这一年李慎之先生在《顾准日记》的序言中第一次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对中国近代史作梳理